

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中国政治学

张贤明



监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国家依据自己的国情,发展出不同的监察制度体系。在我国古代,虽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监察体系,但也形成了较高水平的对官员进行监督纠察的制度。

中国古代的监察智慧

张晋藩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产生与官僚制度的形成有密切联系。在秦代,皇帝之下设置三个重要官职: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并称三公。丞相掌政务,太尉掌军务,御史大夫掌监察。这种体制开创了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格局。汉承秦制,监察机构称御史台,长官为御史大夫,一面参与朝政,一面有“制临百司,纠绳不法”的监察权。唐代监察机构内部形成更严密的三院制,这种体制一直沿用到明清。对地方的监察制度,秦代也已形成,郡一级派有常驻的监察御史。汉武帝时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大监察区,设刺史负责监察。唐代对地方的监察由察院负责。明清时期,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派出巡按地方的官员称巡按御史,权力很大。对政府部门公务进行经常性稽查和监察,开始于唐。到明清时设六科给事中,其主要职责为对六部公务进行稽查、监察。

概括起来,中国古代的监察官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职责:一是维持朝廷纲纪,确保国家活动有序运转;二是纠弹官邪,即纠举弹劾违法失职的官吏,维持吏治;三是监察政务,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个监察网络;四是向中央举荐地方廉吏与人才。监察官吏既可以向地方宣传朝廷旨意与德化,又可把地方形势、吏治状态等及时上奏朝廷。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当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从总体上看,它对调节统治者内部关系、保障统治者正常运转、澄清吏治、保障国家机器的实现起到了积极作用。分析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职责、特点,可以总结出其中蕴涵的智慧。

监察网络覆盖面广。在中国古代,中央和地方的整个官僚体系都被纳入监察网络之中。监察制度不仅覆盖整个官僚系统,而且也涉及国家政务的方方面面,如行政监察、立法监察、人事监察、司法监察、经济监察、军事监察、仪制监察、文教监察、科考监察等。有时还派出御史进行专门监察,如巡仓御史就是为监察仓库而被特别派出的。这些监察制度囊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涉及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在实践中对于纠正违法官吏、监督国家政务实施、贯彻政策与法令等都体现出比较突出的制度功效。

对监察官吏要求较高。严格监察官选任,规范监察官行为是贯彻实施监察制度的重要条件之一。历代选拔监察官首先要考察其道德品质,监察官必须清正廉洁、忠于职守、不徇私情、刚正不阿。其次,需科举出身,以保证其文化素养。再者,监察官要有地方工作经验。此外,监察官必须严格依法监察,如有失监、漏监或贪赃枉法,则加重处罚。如《大清律例》规定:科道官受人馈赠、收人财物,以及买卖多取价利,较其他官员罪加二等处罚。御史纠弹要有实据,不得风闻言事,对于捕风捉影者予以制裁。监察官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比如,汉代中央最高监察官御史中丞和京畿地区的监察官在朝会中都有座位。元世祖也曾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

注重监察立法。随着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监察立法也相应地有所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单项到法典化,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使得监察活动有法律根据。不仅如此,监察立法也限制了监察权的行使,使监察官不得随意超出法律范围行事。清朝的监察法《钦定台规》,集历代监察立法之大成,包括训典、宪纲、六科、各道、五城、稽查、巡察和通例八类,内容十分完备。这也是中国古代治理中重视法律作用的表现。这种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监察法体系,不仅具体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鲜明特色,而且在世界监察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产生于中华文化土壤,其发展历程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发展也必然面临新任务和新要求。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坚持正确研究方向,紧密围绕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不断实现新的超越与发展。

社会主义的发展对中国政治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课题,也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滋养,中国政治学研究也在回应时代问题中获得长足发展。在理论上,科学阐释并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在实践中,以专业的研究成果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让公众乃至国际社会认识并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事实和经验。中国政治学不断与时俱进,挖掘自身学术价值,开创了全新研究图景。

努力方向

当代中国政治学在恢复重建之后获得较快发展,焕发了蓬勃生机,并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入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持,为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发挥了独特作用。然而,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中国政治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也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继续打牢理论基础。对于政治学的基本范畴、理论体系、学科结构和研究对象等基本问题,中国政治学界曾经进行过广泛讨论并初步形成共识。但总体而言,由于中国政治学建设的时间并不长,还需要厚培理论基础。实践发展日新月异,新兴理论不断出现,研究重点也在转移。这就需要对相关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学科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不断完善学科体系。与改革开放相适应,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科交流不断加强,许多新兴交叉学科随之产生。这让政治学学术研究层次更为丰富。新兴交叉学科通常介于多种学科之间,吸收借鉴了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这些学科的定位与归属进行更为清晰的划分,使政治学的理论体系更为完善,研究旨趣更为确定。

进一步凸显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工作者付出巨大努力,在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未来还需要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使中国政治学的中国特色进一步凸显,增强以中国智慧和中国话语分析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现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创新视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发展也必然面临新任务和新要求。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正确研究方向,紧密围绕改革发展中的



重要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来,在各方面条件促成下,中国政治学界通过自身努力,取得了许多重大研究成果,也形成不少值得深入总结与思考的重要经验。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少学者都提出,在当代政治学研究中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使政治学研究能够保持正确方向。对中国政治学而言,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最基本的前提,也是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学者比较系统地研究和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政治问题的思想和论述,根据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推出了一批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的理论著述。历史表明,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才能不断完善,学术水平才能不断提升。

坚持以中国实践为基础。政治学产生与发展的动力源于社会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和实践创新作出经验总结、理论阐释,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的责任和使命。中国政治学创新发展不能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必须植根于中国社会。正因为扎根于中国土壤,中国政治学才充分体现出自身的理论特色、应用价值和实践意义。

坚持以创新发展为动力。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40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理论与学术研究的创新。不囿于固有理论和观点,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勇于提出新理论、新观点。二是人才培养与教育模式的创新。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学术人才培养体系和教育制度,形成了一支具有较强学术创新能力的科研队伍。

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

加强政府执行力研究

敬义嘉

运行方面与西方都有根本区别。西方许多学者都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非凡执政能力,中国各级政府对政策的强大执行力,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各级政府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深化各领域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肩负着更大职责,更加需要增强执行力和公信力,以让人民满意为目标,有力有序地推进工作。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也应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将增强政府执行力作为一项重要研究课题。当前,可以在以下一些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研究增强政府执行力的原则。在长期探索中,增强政府执行力形成了一系列原则,如科学化、程序化、法治化等。科学化原则要求运用现代科学的认知成果,最优配置执行资源,形成高效率的组织体系和优化协同的实施体系。程序化原则要求按照程序办事,政务运行更加公开透明,打破“信息孤岛”,统一明确各部门信息共享的种类、标准、范围、流程,加快推进政务信息互联互通。法治化原则要求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我国政治学研究者可就加强政府执行力的原则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明确各项原则对政府执行力提出的要求以及各项原则之间的关联等。

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对执行力的影响。职能科学是增强政府执行力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围绕优化职能配置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放管服”改革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效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重要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职能日益优化。我国政治学研究者应全面梳理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转变政府职能的历程,分析总结其中的经验规律,研究典型地区的典型做法,研究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和服务水平的途径、方法。

研究机构设置和行政体制对执行力的影响。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是政府执行力的重要载体。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机构设置和行政体制需要继续改革,以更好适应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需要通过改革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适应这一变化,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持续深化。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作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正在有序推进。我国政治学研究者应认真学习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方案等,并进一步研究、思考、阐释其对提升行政效率、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研究如何增强公职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政府执行力的增强关键在人。政府工作人员的知识储备、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对政策的理解等,都影响其执行的动机和能力。用规则约束人、用利益激励人、用价值鼓舞人,仍然是建设高素质政府工作人员队伍的主要方面。政治学研究者可以对录用、培训、管理、薪酬、保障、考核、晋升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思考如何使激励约束、容错纠错机制更加完善,从而为公职人员队伍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研究科技手段运用对政府执行力的影响。在信息化、大数据的技术条件下,通过实时有效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政府可以及时掌握执行情况,就存在的问题采取精准解决方案,大大提高执行效率和针对性。各地蓬勃兴起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践,取得了提高服务效能、降低服务成本等积极效果。我国政治学研究者应以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角,分析当前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进行跨学科研究,研究政府的决策和执行如何更好顺应新技术革命趋势、利用新技术革命成果,从而更有效、更便捷、更精准地发挥职能、服务群众。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社会科学不应缺席人工智能讨论

——《人工智能:驯服赛维坦》简评

曹平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使人类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局限于技术领域,而且还体现在人类认知、社会治理、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因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不能只做旁观者,而应主动参与人工智能的相关讨论。高奇琦撰写的《人工智能:驯服赛维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以一个政治学者的视角,对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讨。

从法律、金融到汽车、医疗,作者对人工智能给这些行业带来的深刻变革进行了概述,并针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变化提出一些新论断,比如“趣缘合作”“人工智能税”“公民数据意识”等。作者还针对人工智能引起人们生活的改变等问题作了哲学思考,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透明人”与“空心人”、数据的自主性、人的数据化等问题。作者认为,应在公平正义原则下发展人工智能。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就人工智能对未来社会可能带来的风险及公共政策等问题作出深入研究,推动人类运用人工智能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社会。

新书评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执行力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行政能力,它是指政府对政策决策、制度纪律、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能力,表现为战略目标和工作任务的实际完成情况。执行力强弱体现着政府的治理能力,影响其服务民众的水平。提高政府执行力是现代国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西方国家,随着政治制度演进,逐渐出现政府组织膨胀、层级过多、保守封闭和缺乏创新等执行力下降的现象。特别是近年来,西方政治体系运行乱象频发,政策实施无力,社会矛盾增加,这引发了西方政治学界的关注思考,发展出多种关于增强政府执行力的学说。

中国的政府执行力在概念、理论和实际